

图三　铜镜拓本(2/5)

铜带卡　13件,分三式。

I式　4件。仅一件完好，卡孔为椭圆形,面上饰凸起的弦纹和链锁纹。长4.4、宽2.1、孔径1.5—2厘米(图二,10)。

II式　7件。五件完好,呈花式,面上起三道楞,背有卡钉三根。厚1.1厘米。(图二,7)。

III式　2件。圭形,面上起四道棱，背有卡钉三根。长2.4、宽2.5、厚0.3厘米(图二,9)。

小铜铃　4件。两件较完好,近球形,中间有一凸棱,铃下端有一长条形孔，直径2.6厘米(图二,11)。

铁马蹬　1件。穿呈椭圆形，脚踏处为弧形,底有一道加力筋。高14.5厘米，宽12厘米(图二,4)。

铁熨斗　1件。已残,圆盘,平底,扁柄,斜口沿。口径15.8、底10.8、高4.2厘米(图二,2)。

铁马衔　1件。已残,圆铁条锻制而成。残长20.5厘米(图二,8)。

铁刀　2件。均残,刃部、背部皆呈弧形。一件长22，另一件长18厘米(图二,5、6)。

白瓷碗　1件。已残,圈足,敞口，五等分连弧口沿。胎骨白细,内施满釉,外施多半釉，釉白中泛青灰色。口径22.3、高9.2、足径8.6厘米(图二,3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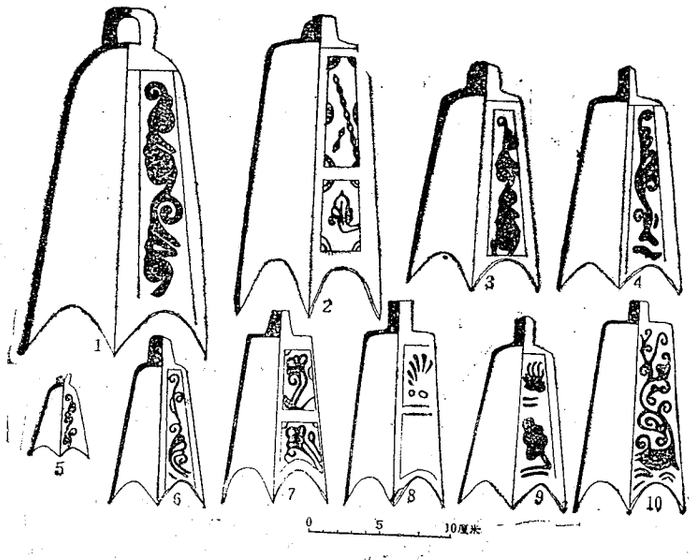
琥珀珠　1件。完好,近似球状,中间有一圆形透孔。直径1.9厘米。

三、结语

此墓未经正式发掘,部分遗物毁坏严重,有的已辨认不出器型。墓中的带扣、马铃等,形状与辽代契丹墓的同类器物相似。据此，推断此墓为辽代墓葬。

墓里的铜镜，当属唐代遗物，这种型制的铜镜在西安东郊高楼村①、扬州②均有发现。墓内的带扣、马铃，与内蒙古敖汉旗沙子沟③、辽宁康平县后刘东屯④出土的同类器物接近。马蹬应是一对两件，仅见一件，形状与哈尔滨东郊发现的马蹬基本一致⑤。墓中的瓷器，仅有一件白釉花口碗。胎骨坚白，釉色光润，属仿定窑品。这种质地的碗不曾见于辽

(下转1115)



图四　铜车铃(1—10)

1990

辽宁盘山县发现辽契丹大字铜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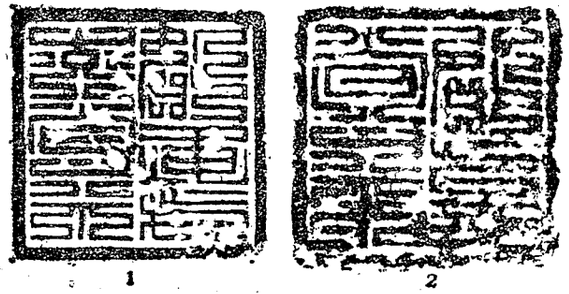
1986年5月中旬，辽宁省盘山县城郊乡宋家店村民徐法森在其承包的水田里劳动时，拾到两方铜印。

印呈正方形,每边长7.5、厚1.5厘米,印钮长3、宽1.8、高2.5厘米,重0.9公斤。印正面阳刻九叠篆书，印背无边款(图一,2)。钮上阴刻一汉文"上"字，以示印的倒正。印文字体较为工整,只是由于锈蚀的缘故,显得表面不甚平整,做工粗陋,字体潦草。经辨识尚可分为竖排两行四字。

此印文经与以往已发表的铜印比较，可认定为契丹大字。其中除了第四字亓由阎万章先生首先识读为"印"后为学术界公认无误外(阎万章:《锦西西孤山辽肖孝忠墓志研究》,《考古学报》1957年2期;冯永谦等:《辽宁建昌普查中发现的重要文物》,《文物》1983年9期)其余三字究竟释作什么,现在尚不能肯定。如第一字颇似汉字之"都"字，在契丹大字《北大王墓志》第十三行中，就有借用汉字之"都"字。这样把第一字释作"都"字应为一种解释。与之相同字的契丹大字铜印，在我省也曾发现过。1973年喀左县南公营子乡发现的契丹大字铜印第一字亦是借用汉字"都"字。该印刘新民同志已经著录，这里权做比较(刘新民:《喀左县博物馆藏的古代铜印》,《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》油印本)。带"都"字的契丹大字印还有一些，就不一一列举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、内蒙古大学语文研究室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编:《契丹大字资料汇辑》(图二,1)所载的契丹文"元帅右都监印"来看，在印背有汉字"元帅右都监印"六字,印文九个契丹字中并无"都"字，也许"元帅右都监印"中之"都监"二字，用的契丹语,而不是汉语借词,所以才没有"都"字。可见，第一字识读为借用汉语之"都"字也仅仅是一种推测，尚有待更多的契丹大字出土资料的认定。此印第二字由于印文模糊,不能确定其楷体如何书写,无法考释。第三字作"沓",把它释读作"之",虽有可能，但这也只能是一种推测，因为可能依据汉文铜印的行文习惯套用到契丹大字铜印之中，并不一定合适。迄今为止发现的契丹文铜印,并没有一方明确识读出为"□□之印"的先例。关健在于与印背汉字印文互相参照,其辨识就较有把据,但现在这类汉文与契丹文可以对照比较的铜印资料甚少，只能有待更多的契丹文铜印发现。

契丹大字铜印，近年来出土著录的日渐增多,但多限于发表资料，解读意释的较少。而令人信服的正确解读的可以说一件也没有,至于"皮室之印"的所谓解读,只不过是任意臆测而已。诚然，此种文字至今尚未找到释读的途径，切盼有关专家与识者做进一步的解读，以期推动和活跃契丹大字学术研究的进展。

(李宇峰)



图一　契丹大字铜印

1.喀左县南公营子乡　2.盘山县城郊乡